

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

明刊戲曲弦管選集

龍彼得 輯錄著文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荷)龙彼得 辑录著文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

郑国权

何勋 曾金铮
苏彦硕 黄少龙

校订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明刊戲曲弦管選集

龍 彼 得 輯錄著文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2003.11

ISBN 7-104-0185-3

I . 明 … II . ①明 … ②龍 … III . ①戲曲 - 選集 - 福建
- 泉州市 ②戲曲 - 選集 - 福建 - 泉州市 ③戲曲 - 選集 - 福建 - 泉州市 IV .

責任編輯 楊錦海

裝幀設計 鄭國權

明刊戲曲弦管選集

龍 彼 得 輯錄著文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澱區北三環西路大鐘寺南村甲 81 號)

郵編:100086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經銷

泉州晚報印刷廠 印刷

8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16 開本 32.75 印張 插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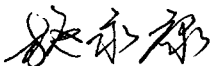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ISBN 7-104-0185-3/J·782

定價:精裝 80 元

序 一

中共泉州市委书记 

继《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出版之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又着手编纂了“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首期推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部南音典籍。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唐代至元朝，泉州“刺桐港”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港口，享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盛誉。泉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地方传统艺术绚丽多姿，至今仍保留着南音、南戏、南少林、南建筑等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活化石”般的宝贵价值。尤以古朴典雅、独具魅力的南音闻名海内外，它植根于泉州并延伸于闽南语系地区，同时远播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成为一种充满浓郁乡情、激发爱国爱乡热情的“乡音”，堪称“中国古典音乐的珍品”。泉州南音吸纳了中原文化、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精华，长期以来名家辈出名曲荟萃、新秀蔚起薪火传承，呈现“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盛况。其交流传播的国际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已超越音乐本身，成为连结海内外同胞和海峡两岸乡亲的桥梁和纽带；其所蕴含的巨大文化研究价值，充分说明南音不仅是植根于名城泉州的艺术奇葩，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音乐瑰宝，更是海内外共同珍惜、保护的世界文化财富。

我们一直强调，保护、继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神圣的使命。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南音的发掘、抢救、扶植、保护和发展，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同时，“中国泉州南音”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把它作为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文化园的一个重要抓手，致力推进泉州“海丝”文化和闽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创

新和传播。我市先后举办七届规模盛大的“中国泉州海内外南音大会唱”，今年又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启动“2003 中国泉州南音年”，为促进泉州对外、对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海峡两岸、海内外闽南人的联谊和交流作出了积极努力。

“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的编纂出版很是值得庆贺。丛书的前两部即《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是泉州南音迄今发现历史最早的正式出版物，其曲文和古谱蕴藏了大量音乐历史的宝贵信息，有些内容甚至可以直接与盛唐音乐联系起来。这两部南音典籍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为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必要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它们的付梓面世，恰逢其时，恰逢其用。

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序 二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文章

“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之一《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之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即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继编纂出版十五卷本《泉州传统戏曲丛书》之后，又一项挖掘、抢救中国传统艺术遗产的重要成果。

泉州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积淀，同时又以梨园戏、南音、傀儡戏等在当今舞台以“活化石”形态的呈现而令人注目。去年底，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泉州南音、梨园戏、傀儡戏同中国的昆曲、古琴、藏戏等共十个项目被亚太文化中心列入“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这正是泉州优秀民间传统艺术独特价值的一个说明。泉州地区是蕴藏民族民间优秀艺术遗产的富矿区，正是因为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专家、学者们意志坚韧，坚持孜孜不倦的搜求，才使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近于湮灭的传统艺术遗产重新显现；也使那里的南音、梨园戏、傀儡戏等艺术品种的舞台演出，有了不竭的资源；也才使今天的观众从舞台演出中，窥见到历史的艺术遗存形态，得到韵味醇厚的审美感受。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工作成果的意义，当然不局限于泉州，它对优秀的传统艺术遗产在今天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作为“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开头的第一、二卷，给人的第一个鲜明印象是史料珍贵。比如三种明刊戏曲、弦管中，竟然可以找出我们今天可知的三十多出戏的痕迹，其中还保留有晋唐以来的丰富的音乐历史信息。这两卷书，对于研究戏曲、音乐传承、衍续都有重要价值。著名戏剧家郭汉城先生在评论此前出版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时指出，“卷帙如此浩繁，内容如此丰赡，在我国其它剧种尚未见到”也是适用的。从即将出版的第一、二卷和今后拟陆续出版的内容看来，编纂者视野

开阔，对有关“泉腔戏曲”和弦管的史料广收博取，整理汇编，献之社会，为人们的创作、研究借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丛书给我的第二个鲜明的印象，是它体现的独特价值。这使我想到“古、今、中、外”四个字。所谓古，即“丛书”辑录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在海内外都属孤本，千金难求。其内容对于研究中国戏曲的衍变发展，对于唤起传统精萃的表演记忆，尤有价值。

所谓今，即上述的这批明清戏曲史料记载的音乐、表演的内容，有相当部分可以在泉州现在的南音、梨园戏、傀儡戏等的舞台上找到活生生的存在，瓜瓞延绵，一脉相承。并且，现在的不少南音曲目和梨园戏、傀儡戏的剧目，也可以从这批史料中找到它们的渊源所在。它不仅是梨园戏、傀儡戏、南音等顽强生命力和发展变化历史轨迹的印证，同时也为今天这些古老艺术品种在舞台上活生生的呈现注入了源泉。

所谓中，就是丛书辑录的文化遗产，从衍生的地理位置来看是泉州的，从声腔角度来说，也是特色鲜明的“泉腔”。但从其内容和历史渊源来考察，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国古老音乐与戏曲的宝贵遗存。学术界的专家常感叹唐宋的音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宋元南戏也隐匿得无影无踪。但当人们亲自听了古老的弦管，亲眼看了梨园戏和傀儡戏的演出，便会在惊喜之余，不由地对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泉州梨园戏是宋元南戏的遗响之说给予认同。而南音与戏曲“照古音”唱曲道白的泉腔方言，语言学家则一致认为不是所谓的“土语”，而是来自“河洛”的古汉语。凡此种种，有兴趣研究源自中原的中国古老汉语、音乐和戏曲的人士，对于丛书的出版，无疑会认为是非常珍贵的。

所谓外，就是泉州的戏曲、弦管，并不囿于闽南一带，而是随着华侨的足迹，走遍南洋群岛和其他各个闽南华侨的聚居地；在台湾地区的流播，则是明末随着郑成功带领的军民去收复台湾而传遍全岛，于今台湾的南管和南管戏，都是泉州弦管和梨园戏的嫡传。香港、澳门地区的南音演唱和戏剧活动，也都与泉州的传衍、支持有直接的关系。从1977年新加坡首倡南音大汇唱至今二十多年间，海内外南音文化圈共举办了十四届国际南音大汇唱。这种壮丽的场面，世上任何古老乐种在今天都难以出现，显示了泉州南音强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正因为这样，泉州许多珍贵的戏曲、弦管史料，也由华侨和商人的带出和其它渠道的外流，分散在欧洲、日本和南洋各地，其中一部分有幸保存下来。这次丛书一、二卷编入的珍贵史料，几乎都来自海外和境外。明刊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是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从英国和德国图书馆发现的；文焕堂指谱则是台湾成功大学胡红波教授三年前用高价从旧书市上购得的。得益于改革开放

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期，又有赖于泉州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同仁锲而不舍，长年努力，四处搜求，才能把这些分散于四海的珍贵史料征集起来，加以汇编、校注出版。其用心之细，用力之多，非同一般；其成果之丰硕，其意义之重大，不可低估。从抢救、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以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发展而言，仍可以借用郭汉城先生在《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序言中所写的一句话来概括：“千秋事业，功德无量”。

赞佩之余，谨为序。

2003年8月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序 三

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田青

过去，我曾经慨叹：“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民族音乐’中的绝大部分，为什么和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古典艺术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么格格不入？常常，当琵琶的轮指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扫向无辜的听众；当二胡的弓子如‘白驹过隙’般在两根弦间奔突；当竹笛和唢呐在舞台上扬起田径场上的口号，比赛谁‘更快、更高、更强’；当我们像西洋管弦乐队一样庞大的民族乐队得意扬扬地奏起《拉克齐进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在皱眉头：这是我们的‘华夏正声’吗？”直到听到泉州南音，我才听到与我血液中的音乐基因相互唱和的声音。

过去，我曾经慨叹：“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机，有时候，只好凭我们寻扯獭祭。现世之人，谁都没有陪孔老夫子在齐国听过韶乐，所以，谁都说不清楚老先生到底为什么听过它之后竟然三个月吃不出肉味来？三千太学生‘转世’至今，也恐怕都淡忘了嵇叔夜的慷慨与悲凉，没有谁能说得清为什么斯人逝去便该‘于今绝矣’的《广陵散》至今仍有琴人在弹？”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佛教讲“因缘”，泉州南音能作为华夏正声流传到今天，有着特殊的原因和条件。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以至两宋，中原的士族、皇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最终一大部分人定居泉州。他们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带入泉州，并逐渐流入民间，世代传衍。中国古乐中绝大部分的物质构成和形态构成，在中原大地以至大江南北，大都只埋在五代、魏晋墓葬中的砖刻石刻图像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活

生生的唐宋音乐遗响，却大量保存在南音当中。南音中自成体系的工尺谱，南音中的横抱琵琶、尺八、拍板、箏、轧筝、笙等乐器，南音的演唱規制，以至一首首具体的乐曲，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作为中古音乐的历史见证。

曾经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的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其所谓古，是南音有千年的历史；其所谓的多，是南音有大谱、散曲和套曲达二千首以上；其所谓广，是南音不只活跃在闽南地区，而且扩展到南洋群岛和台、港、澳以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谓强，是南音历经无数的天灾人祸和漫长岁月的磨汰，还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其所谓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叠拍声。赵朴初先生生前在泉州听过南音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管弦和雅听南音，唐宋渊源大可寻。不意友声来海外，喜逢佳节又逢亲。”更生动地道尽了南音的艺术魅力和深邃内涵。

我曾经与泉州的朋友探讨过南音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问题。他们认为，南音的主体部分，决不是里巷歌谣，也不是所谓的源自戏曲音乐，而是唐宋宫廷和教坊中的乐师、乐工的杰作。如大谱中的“四（时景）、梅（花操）、走（马）归（巢）”和《阳关三叠》等，都是纯粹的“虚谱无词”的古曲，是非常难得的、艺术水准极高的纯器乐作品。也许它们一开始传入泉州时就已经非常成熟，因而就十分凝固。所以历代弦友对它们只能是认真保守，不敢轻举妄动。有位新文艺工作者，发现有首散曲中的一个词，只要移动一个音位，就可使咬字叫音更加明确，但立即受到多位艺师的斥责，认为“尽管说得有理，但谁敢动它！”由此可见，管弦界忠于传统、保守传统是很坚定的，因此才会历久而不变异。其二是，南音在爱好者当中，是深入人心、融化在感情深处的，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听说当年在破四旧时，有的弦友墙上挂的是“样板戏”的曲谱，口中唱的却仍然是南音。在海外，有的地方长年禁止华文活动，但不少华侨仍然关起门来唱乡音，在他们心中，南音，是祖宗的灵魂，是故乡的明月，是游子心中永恒的记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南音是永远不可禁绝和扼杀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泉州市政府就组织了南音研究机构，整理南音曲谱，并成立了专业南音团体。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举办了七届南音国际大汇唱。“中国南音学会”于1985年在泉州成立，先后举办了三届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在南音史料的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泉州市政领导，支持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纂出版了《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十五卷，把梨园戏、傀儡戏的传统剧目、音乐、表演和相关的南音曲词七百多首汇编在一起，成为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南音南戏的重要资料。

去年以来，泉州市政领导又支持地方戏曲研究社启动“泉州戏曲弦管研究

丛书”的编纂工作。现在，已有两部书稿的清样放在我们面前。两者共有上千的页码，史料珍贵，内容丰富，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刊刻行世的弦管曲文和曲谱。它们的底本，一是尘封在英国和德国图书馆几百年才被牛津大学汉学家龙彼得先生发现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一是在内地多年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文焕堂指谱》，却为台湾成功大学胡红波教授在市上高价购得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它们虽然是明清坊间的出版物，但保古存真，许多重要的音乐历史信息 and 一首首古曲的面貌，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有如两个中间环节，把南音发展千年的链条连接了起来，意义非同寻常。

例如，《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刊载的《唐燕乐二十八调表》的具体音乐形态，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但在《明刊戏曲弦乐选集·百花赛锦》中，却保存几十首标明〔双〕〔越调〕及〔背双〕等源自燕乐二十八调调名的散曲。于今则以〔倍工〕〔中倍〕和〔大倍〕〔小倍〕的调名存活在南音中。而这些〔双〕〔背双〕的曲文周围的撩拍符号，与现在的曲薄的撩拍也相当接近，有的则完全吻合。

又如在《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三十六套“指谱”中，有一些与唐《教坊记》中记载的唐代曲名同名，如《拂（谱音误作舞）霓裳》、《后庭花》等。《指谱》收录的十二套大谱，其名目古朴纯真，以一节、二节、三节等来区分音乐的章节，一扫《泉南指谱重编》中编者加上的曲牌和花哨的名目，从而纠正“谱，即大谱，为曲牌连缀的套曲”的误解。大谱的第一、二、三套，分别是《三面金钱经》、《五操金钱经》和《八面金钱经》，而不是被改动的《三台令》、《五湖游》和《八展舞》。同时，这三套大谱中还有〈喝哒句〉、〈番家语〉等名目，再联系指套中的廿二套有〔太子游四门〕的曲牌，卅六套《南海观音赞》有“落〔普庵咒〕佛头至佛尾廿二节”等等，让人清晰地看到佛教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影响。

泉州的朋友要我为《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付梓写个序言，我对南音是外行，但这不妨碍我对南音的热爱和长期致力于保存、传承南音艺术的朋友们的尊重。因此，拉拉杂杂写下些感想，不敢称之为序，只是借此表达一下我对南音的感情而已。

校订本出版前言

郑国权

—

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龙彼得先生（1920—2002），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英国和德国的图书馆发现了中国明代刊行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和《集芳居主人精选新曲钰妍丽锦》、《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等三种闽南戏曲、弦管选集，随后经过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用英文写成了《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的长篇文章，连同三种明刊本书影汇编在一起，于1992年5月，自费在台湾南天书局出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以下或简称《明刊三种》）一书。1993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获得龙先生的赠书之后，经征得龙先生的同意，决定翻译他的论文为中文，以同样的书名在中国大陆出版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龙先生长篇文章的翻译工作，我们央请南京的戏曲史家胡忌先生和他的夫人、时任南京大学英语教授的杨女士共同承担。这对最佳搭档经过了几个月的辛勤笔耕，终于把二三百页的译稿带到泉州来，经打印后邮给龙先生审阅。几经反复修改，龙先生只同意先用第一章《被遗忘的文献》，连同三种明刊本书影，由我们编辑，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95年10月，这部北京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正式出版发行，随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高评价。1996年10月，龙先生应邀出席“96泉州中国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带来经他审订的论文中译稿的第二、三章，由我社编入《明刊三种之研究》一书，印发作为会议材料。

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龙先生治学态度极其严谨，惜墨如金，片言只字都不许有任何歧异，有些时候几乎近于苛刻。因此，我们多次希望他尽快审订论文第四、五章，以便连同前三章汇编成整篇论文发表或出版，尽早提供给学术

界学习和研究，但终未如愿。后来我们听说他请台湾大学王樱芬教授翻译了第四、五章，但其译稿一直压在他的书案上。1999年10月，龙先生应邀出席“泉州学研讨会”；10月18日，泉州市有关部门为“《明刊三种》发现四十周年暨龙彼得、朱展华、吴捷秋八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接着，他在出席“泉州学研讨会”以后心脏病再次发作，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于11月10日启程返回牛津。在机场送行时，我们再次提请他在健康情况允许下，尽可能审订第四、五章译稿的事，他欣然答应了。他回去后的一、二年间，与我们又有多次书信往来，从信中得知他曾想做心脏搭桥手术，奈因高龄又有糖尿，医生不许。其后，他好像自觉良好，又孜孜不倦地做学问。2002年5月22日，这位好学、博学 and 顽强自信的长者，终因敌不过病魔而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令人痛惜！

为了纪念龙彼得先生，实现他生前的意愿，我们电请他的学生、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王秋桂教授，在去牛津看望龙夫人之时，请代问候并征求她的同意，把原译稿带回，以便汇编出版。此事总算顺遂，译者王樱芬教授在百忙之中，又认认真真地为译稿修改、校正，并经王秋桂过目后，于2003年4月发电邮给我社。

岁月不饶人，十年一瞬间。我们简略回顾以上背景说明，全文刊发龙先生研究《明刊三种》的长篇论文，让戏史界共享龙先生的学术成果，一直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也是我们组织出版这本《明刊戏曲弦管三种》的主要目的之一。

其二是，《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北京版于1995年出版以后，引起学术界、戏曲界的兴趣，纷纷从戏曲、弦管、方言、音韵等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有的青年学子还把它作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但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大学生或青年学者的情况来看，他们要深入研究《明刊三种》还有一定的困难，其所遇到的主要难处是：

三种明刊本都是刊刻于四百多年前，又是用当时或更早期的闽南方言写成的（除两出保留大量官话的折戏之外），其中有许多方言俗字、略笔字、借音字、错别字或自造字，往往使得非闽南语地区的人士难以卒读；即使是生长在闽南语环境的青年人，也会对那些古老的方言俗语，感到十分生僻费解。同时，其中一些曲词和话白需要“照古音”唱读，倘若不加注明，不但会造成唱念不准，而且会失去古戏文所保存的古汉语音韵的重要价值。

三种明刊本都没有标点符号，有些曲词、话白要断句很难。尤其是曲词，模棱两可的地方很多，断句不准，意思全反，也会因此而造成失韵。

三种明刊本都使用了不少当年坊间刊刻俗文学所使用的代号，或为了省句，或为了略笔，或为了标示乐曲上的某种内容，常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符

号。对这些东西，如果不是相当熟悉传统戏曲及其刊本、抄本的人士，一般是无从辨识或解读的。

有鉴于此，我们于1996年曾对《满天春》的十八出戏，除了〈尼姑下山〉、〈和尚弄尼姑〉等两出“官话”戏以外的十六出折戏，作了初步的校订，收入作为学术会议材料的《明刊三种之研究》一书。其后，《满天春》中与现存梨园戏传统剧目有关的十三个折戏，也于1999年收入《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梨园卷》之中。这次，我们又对《满天春》十八出戏进行重新校订，以前校订时对某些方言语词、俗字判断、解释不当的，也都加以改正。

这次我们的精力主要花在三种明刊本中的二百七十二首弦管曲词的点校上面。对曲词中那些疑难的断句，那些百猜不得其解的自造字、漫漶字和略笔字，我们仍然采取“会诊”的办法，不断地讨论、修改，力求做到准确。

其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纪之交，提出保护“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目标。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泉州的南音（古称弦管）、梨园戏、傀儡戏，连同兄弟地区的昆剧、古琴、藏戏等共十项古老的传统表演艺术，已被列入亚太地区表演艺术数据库。而泉州市也决定以“中国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并且已经正式上报。面对这个新的历史机遇，龙先生辑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更显现其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既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又是优秀的民间艺术的代表作，两种独特的文化品格兼而有之。明代刊刻行世的这批梨园戏戏文和泉州弦管曲词，以及由剧中人提到的傀儡戏的表演和部分傀儡戏唱段成为弦管曲词的内容，都兼容在这部书中。亚太地区把泉州南音、梨园戏、傀儡戏列入中国表演艺术十大数据库，有了这本《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不正是这三种表演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证据吗？因此，把这三种明代刊本连同龙先生的论文全文汇编出版，无疑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

二

1995年我们编印出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之后，曾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一股研究热潮，有的研究者首先提出：这一种明代刊行的戏曲弦管选本，究竟是何地的文化遗产？“闽南”相对来说是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在明代应该指泉州、漳州一带；在近代则包括泉州、漳州、厦门。辑录者龙先生是非常谨慎的，在他的论文中虽然提到十八个折戏的绝大部分和弦管曲词中的百首左右，都仍在泉州的梨园戏和南音中经常地演出或演唱。但他认为刊行者是“瀚海书林”，可能就是现在隶属漳州的“海澄”。而戏文、曲词中有不少以“佐”表示

“做”，也可能是漳州的方言读音。凡此种种，他当时为这部书订名时，冠上“闽南”这个地域概念是无可非议的。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我们认为，历史上漳、泉两地的文化互相交融是毋庸置疑的。但从梨园戏和弦管（今称南音）的历史来考察，它们只产生于泉州。它们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论是梨园戏，或是弦管，一概以泉州府治的方言声腔为咬字吐音的标准音。（至于佐作做，泉州傀儡戏四十二部落笈簿和梨园戏抄本，都是如此，为的是略笔，而非读音不同之故。）数百年来，泉州以外地区搬演梨园戏或演唱南音，无不要以“泉腔”为准。正如《闽书》所云：“（龙溪）地近于泉，其心好交合，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使操‘泉音’，一韵不谐，若以为楚语。”

再者，要以现存的戏曲、弦管，与明代刊行的三种戏文、弦管曲词进行对照印证，也只有当今的泉腔戏曲才保存这些实实在在的内容，也才可能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泉州不但保存与明刊戏曲弦管一脉相承的刊本、抄本，而且有活生生的表演实体在经常地演出或演唱。1996年以讨论《明刊三种》为主题的南戏学术研讨会，梨园戏剧团演出《明刊三种·满天春》的五个折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弦管，更是天天在泉州城乡各地弦歌不绝。

基于上述认识，这三种明刊本，从声腔的角度来说，称为“泉腔戏曲弦管”，似乎会更为明确的。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泉州文化界自然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明刊三种》的推介和研究工作。也正是在《明刊三种》的触发下，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从1993年起，开始收集梨园戏、傀儡戏的传统剧目、音乐和表演的历史资料，编纂《泉州传统戏曲丛书》一至十五卷，已于2000年底全部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齐发行。2001年，我们又出版了一本《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作为这部“丛书”的编校札记和补遗。有了这套“丛书”，加上《明刊三种》，要切实推动闽南传统文化和以泉州为中心的南音、南戏的研究工作，就有了比较翔实的资料和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在编校《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前后七、八年中，也益发感受到《明刊三种》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对它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也不断有些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我们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闽南是宋元南戏发祥和流播的地区之一，其繁荣的态势几乎达到泛滥的程度，以致当时出治漳州的朱熹和出治泉州的真德秀，都曾先后下令禁戏。由于当时的民间戏剧活动是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非法的，所以戏剧史料就难以保存下来；当地的史籍志书更是不屑提及，使得宋元以来闽南地区的戏剧史料十分匮乏。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三五娘》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刊本《荔镜记》先后在日本、英国的图书馆发现，令人喜出望外。但也只是个例。整个明代近三百个

年头，民间戏曲活动高度繁盛的闽南地区，不可能只有孤零零的这么一本戏文。终于，龙彼得先生发现的明刊三种，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明代泉州戏曲、弦管的历史风貌。因为比起《荔镜记》来，《明刊三种》不但有十八个折戏，而且有弦管曲词二百七十二首。可以说是个大面积的发现。

龙先生在研究了《明刊三种》后所写的长篇论文开头便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二十六出戏的痕迹，其中有几出已不复存在。有的在中国任何场合都没有记载”。

这二十六出戏是：蒋世隆、刘奎、田真、吕蒙正、朱弁、郭华、祝英台、朱文、杨管（以上九出刊于《满天春》），赵氏孤儿（赵盾）、苏秦、尹行义、孟姜女、王昭君、董永、姜诗、蔡伯喈、貂蝉、张珙、刘智远、陶秀实、高文举、王十朋、陈伯卿、陈彦臣、商辂（以上十七出的残曲分别刊于《锦曲》、《丽锦》、《赛锦》）。

我们在编校《泉州传统戏曲丛书》过程中，又查出六首散曲源自梨园戏《王魁》、《孙荣》、《刘文龙》，以及一首不知是否属于梨园戏的《秋胡》；又有五首分别属于傀儡戏四十二部落笼簿的《仁贵征东》、《五马破曹》。至此，认为从《明刊三种》中可找到的不只是二十六出而是三十多出戏的痕迹，是可以成立的。为便于查阅，特将在弦管中新发现的剧目痕迹罗列于下：

1、王魁 《满天春》下十三 ab，桂英唱〔醉扶归犯〕“坐来”、“袂记得”。

2、孙荣 《钰妍丽锦》三十，孙荣唱〔二调〕“受尽艰辛”。

3、秋胡戏妻 《百花赛锦》二十，罗梅英唱〔双〕“只园内正是春天”。

4、刘文龙 《钰妍丽锦》二十九 b、《百花赛锦》上十四，萧氏唱〔双·三台令〕“记得共君”。

5、仁贵征东 《满天春》十三〔风云会〕“又”柳三娘唱“我只处离恨”；《满天春》二十六，柳三娘唱〔滚〕“银烛秋光”；在这前头尚有〔剔银灯〕、〔锦廷乐犯〕二首，虽无现存谱例为证，姑暂存疑。但它们显然是归在〈扑流萤〉题下，故当予以认定。（参看《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十五·P242—249〈傀儡戏音乐曲牌〉〔扑灯蛾滚〕；P422，〈傀儡戏音乐曲牌〉题作〔叠字普天乐〕）

6、五马破曹 《满天春》三十九 b，春香唱〔大迓鼓〕“正更深天边月上”（参看《丛书》三 P457 梨园折戏〈春香闹〉；十二 P144 傀儡戏〈五马破曹〉；十五 P125〈傀儡戏音乐曲牌〉题作〔潮调〕）。

此外，我们还见到的一些论著，分别指出尚有十三首曲词，来源于《南楚材》、《杜牧》、《延章娇鸾》、《梁意娘》、《刘阮天台》、《真凤儿》、《狄龙》、《聂胜琼》等剧目，其主要出处来自《泉南指谱重编》。龙先生在论文中说：“人们

认为林鸿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曲词故事来源的考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他对于曲词来源的许多看法往往只是臆测……有十个之多是无法证实的，其中有几个需被全盘否定，有几个则仍需存疑。”对此，我们曾作些查证，但苦于手头资料不足，只发现有几个“人物”的故事，而不是戏文（尤其不是闽南戏文），故不敢贸然断定。

从上引材料看，不论是龙先生查出的二十六出戏的痕迹，或是我们多发现的几出戏，总的说，在这篇幅不大的三种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竟然有三十多出戏的痕迹（以后还可能再辨识出一些剧目的残曲），这就足以说明：泉州地区在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戏剧演出活动是十分繁荣的，大量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剧目都曾经上演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南戏早期的剧目，如南戏“实首之”的《王魁》、《蔡伯喈》，以及属于“宋元旧篇”的《朱文》、《孟姜女》、《祝英台》、《张珙》、《陶学士》、《貂蝉》、《秋胡》和荆、刘、拜、杀等古老剧目，或全本戏文以泉州方言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下来，或在明代就已成“残曲”留存在弦管当中。其中《满天春》的《朱文》，明初官方在编《永乐大典》时，就已经找不到这本戏文，只能辑录“佚曲三支：〔中吕近词·红衫儿〕、〔前腔换头〕、〔杵歌〕”。但泉州梨园戏却保存这个剧目完整的三折戏，而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从民间购得清同治年间的手抄本（按：以前曾据抄录戏文的旧账簿年号，误认为是道光抄本，应予更正。此外，梨园戏剧团上世纪五十年代恢复排练上演时，曾因当时环境而把一捻金由鬼改为人，以致以讹传讹，使几部重要论著引述错误）。而《满天春》的〈一捻金点灯〉、〈朱文走鬼〉，则可认定它们是同治抄本在明代的版本，彼此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又都是用地道的泉州方言抄写或刊刻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实际”出发，再联系南戏“实首之”的《王魁》、《蔡伯喈》等剧目不但整本戏活生生地保存在梨园戏当中，于今仍在演出；而且其中大量的唱段，早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就被弦管所吸收，并历经数百年一直传唱下来。那么，认为泉州地区或闽南语地区是中国南戏早期的发祥和流播地区，是有史实依据的。泉州这种以戏班不间断的传演和以弦管班社的世代传唱、双轨并进传递宋元的戏曲文化的方式，在举国上下是独特的、少有的，所以泉州地区才能更有效地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刊三种》的出现，无疑可以带动我们从民间实际的戏曲活动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有限的案头书面上），去发掘更多鲜活的材料，为研究中国南戏，甚至为充实或修订中国戏剧史，提供十分重要的证据。